

城市公众安全文化教育模式研究

——以“北京城市居民危机意识社会调查”分析为例

韩淑云 金磊

[摘要] 分析了我国城市灾害特点及规律,以“北京城市居民危机意识社会调查”分析为例,说明北京市民对灾害的应对能力不强,难以适应“平安北京,安全奥运”的要求。为此,集中研讨并提出了有助于提高城市公众安全文化教育的方法及对策。

[关键词] 城市灾害源 安全文化 社会调查 建议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ules of civic disaster.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ase of the survey on Beijing citizen's crisis consciousness, the paper considers that the civilians of Beijing have not got sufficient abilities against calamities and are not qualified to the requirements of "peaceful Beijing and safe Olympics". Therefore, the paper discusses and puts forward methods and policies which will be helpful to strengthen the culture of urban public safety education.

Keywords: calamity source in city; safety culture; social investigation; suggestion

2006年2月,国务院颁布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提出了“政府推动,全民参与,提升素质,促进和谐”的指导方针,制定了“十一五”期间的主要目标、任务和措施以及到2020年的阶段性目标。其中,明确指出要以未成年人、农民、城镇劳动人口、领导干部和公务员4个重点人群科学素质的提高带动全民科学素质的整体提高。2006年10月,北京减灾协会承担完成了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立项的《北京城市居民危机意识社会调查》调研项目,在北京减灾协会、北京市科协科普部、北京市城八区科协的组织协调下,调查范围涉及北京市城八区近40个街道、100多个社区,发放调查问卷2300份,回收2300份,有效问卷2300份,有效回收率为100%。调查活动的对象有公务员、事业单位

人员、公司、企业管理人员、科学技术人员、教师、工人、自由职业者、社区居民、农贸市场人员等。调查内容包括:公众对突发性重大灾害与灾难爆发的整体趋势的认识;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发展与风险的关系;危机形态中居民最关注的事件;居民应对危机的对策方面的能力;公众对经济危机事件的意识状况;北京城市居民的风险意识与危机应对能力方面的具体意见和建议等,共计49个问题。

一、我国城市灾害特点及规律再认识

2006年纪念唐山“7.28”大地震30周年之际,笔者思考中国城市防灾减灾问题时曾提出:把握新形势下的城市灾害特点及规律是有效开

展城市安全减灾科技与管理工作的前提。早在1997年12月的《城市灾害学原理》一书就对城市灾害源作了十四大类的归纳,2005年3月出版的全新版本的《城市灾害概论》一书又对城市安全与防灾减灾予以适合现代城市发展的归纳。现代城市灾害的特点决定了不仅要研究传统的安全减灾问题,也要涉及非传统安全问题,过去综合减灾意义上的城市自然灾害与城市人为灾害的分类显然是不够的。因为现代城市不仅要关注“9.11”事件后的恐怖事件、印度洋的世纪大海啸,还要考虑类似禽流感的在全球分布开来的灾变。伦敦帝国大学的尼尔·佛格森教授认为,2005年迄今的全世界禽流感甚至比1918年“一战”时更可怕的浩劫——“西班牙流感”还厉害(1918年的流感在不到两年时间内夺去了5000万人的生命)。面对近年来屡发不止的火灾与爆炸、流域性的水污染、矿难及其事故扩大化、地震与地质灾害、群体性突发事件,使我们将原本就正视城市安全的目光加倍地调整并强化。2006年2月公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不仅强调城市防灾区划规划及事故灾害监测,还从多方面对城市公共安全的科技发展重点予以描述。应该承认并肯定以下问题和认识。

1. 中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造成了城市的脆弱性及应对城市新灾害源的复杂性。

2. 中国城市灾害与事故的特点不仅具有历史上灾变的综合性,更叠加诸如生物化学灾变、城市工业化与城市生命线系统事故交织的新灾害;对城市的威胁不仅在于其失控后果的严重性,还在于事故潜在的长时间的杀伤力。

3. 中国城市的高速化发展,尤其是2008年北京奥运建设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建设,使得安全减灾难题倍增,仅用传统的事故致灾分析机理不可能予以解决。对此,不仅要有最大灾害状态的风险分析,还必须评估并辨识现有城市及项目的安全保障能力。

4. 中国城市的事故与灾害面临着高风险的挑战:不仅灾害种类形态具有多样性、集中性,灾害的发展还有复杂性、连锁性及危机的放大

性。近年来国际社会应盘点的大灾当属“卡特里娜”飓风所招致的“连环型”灾难及损失;深刻影响中国城市的灾事当属“吉林—哈尔滨”危机事件扩大化所导致的与环保分不开的跨流域、跨城市甚至跨国界的应急大救援。

5. 中国城市事故灾害已被纳入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公共事件应急条例中四大类危机事件之中,它要求城市管理者及城市安全减灾科技工作者要从城市自然灾害、城市人为事故、城市公共卫生事件、城市社会恐怖事件4个层面去把握城市安全的态势。

总体上看,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在快速提升,不少报告预测203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将达到60%以上,这就意味着每年有上千万人口要迁移到城市。城市一方面要承受固有的灾害源的侵袭,同时要在发展上承受安全容量难以允许的事故灾害攀升的事实。因此,按不同灾害等级、不同城市化发展水平开展灾害区划研究十分必要,它不仅可指导有序的、安全的城市化发展,同时也为城市事故灾害的充分备灾能力建设提供地域上的空间准备。鉴于现代城市灾害与事故的跨地域性、更快的扩散性及难感知性,本文试从以下几类具体灾种出发去认知城市灾害的特点及规律。

城市水灾 水灾作为突出的城市灾害,同样是某一城市化区划致灾因子危险性的表现。基于历史数据研究发现,在1949—2000年中,洪灾在中国各大城市内普遍存在且呈上升势头,尤以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等几个都市群为明显,北方的大中城市的洪灾次数也在波动中上升。总的区划是:长江流域仍然是洪水高发区,以下依次为珠江流域、松花江流域、海河流域及辽河流域,黄河及淮河洪灾也不可忽视。城市是巨灾的承载体,不少大城市都在城市暴雨来临时表现出异样的脆弱性,这是城市化盲目发展、城市安全规划未真正到位的体现。它警示城市防洪要在流域及城市本身两方面关注洪灾风险的变化,特别要警惕城市暴雨之灾。

城市地质灾害 现代城市地质灾害具有自然、社会及资源属性。目前,应加强的是地质灾害的社会属性,目的是通过人类活动扼制地

质灾害的产生,从而实现地质作用向减灾作用的转化。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的研究报告给出了近10年我国突发性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地域分布特征及造成人员伤亡的危险性分区。其中,高危险区有云南、贵州、四川大部、广西大部、广东北部、湖南中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大部、山西西部、甘肃南部及青海部分地区,面积在200万平方公里以上,死亡人数占全国同类死亡人数的95%。全国受多种地质灾害侵扰的城市近60座,县级市以下的城镇近500个,某些城镇如四川松潘、南坪,云南兰坪、元阳,新疆库车等县因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不得不搬迁重建。总体上讲,我国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地质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上还需进一步调研、强化保障。北京市也是地质灾害较严重的城市,具有灾害频发、灾种多、群发性强等特点,并存在大量隐患。以泥石流为例,有9个区县的60多个乡镇有泥石流;又如,从时间分布上看,塌陷灾害逐年增多,矿山地震有增加的可能,这对区县城乡建设,尤其是新城及新农村建设提出了安全选址的挑战。

城市沉降严重 中科院2004年科学发展报告指出:自1980年代迄今,我国地面沉降已由沿海城市向大面积区域扩展,由浅部向深部发展。地面沉降这种地质灾害已成为影响大中城市安全发展的制约因素,如近40年来地面沉降已经给长三角地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500亿元。中国几大直辖市都在下沉:天津的塘沽地区20世纪90年代比60年代海拔高度降低了3米,海河呈现了海水倒灌的态势;上海地面平均以每年10毫米的速度下降,有专家预警,再下沉2米上海会陷于汪洋之中;北京有5个地区(东郊八里庄—大郊弯、昌平沙河—八仙庄、大兴榆一礼贤、东北郊来广营、顺义平各庄等地)出现较大的地面塌陷,最严重的地表以每年20~30毫米的速度下沉;西安地区截止到2003年,因地面沉降等超常破坏毁坏楼房170余栋、道路74条,累计错断生命线系统事故60余次,著名的唐代大雁塔向东北方向倾斜1004毫米,钟楼已下沉1000毫米之多。虽

然地面沉降为缓变性灾害,但其发展是不可逆的,对城市发展的威胁是:建筑物地基下沉,房屋开裂;地面水准点失效,地面高程资料失效;影响城内外河道输水,使城市暴雨内涝大幅增加。

城市气象灾害 影响多数城市的气象灾害有台风、暴雨、冰雹、大雾、高温、高湿、雪灾、沙尘暴、雷击等。每年全国因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占总损失值的70%,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以上,受灾害影响人口在4亿以上。城市气象灾害加重的原因主要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人口迁移与城市化过程对自然界产生巨大的负作用,如城市内的自然植被遭砍伐,城市成为地球上稠密的生态破坏网点,从而使城市本身失去维护环境的功能;城市建筑与道路的不透水地面阻断了雨水渗入土层的通道,正是这种对自然界的本质破坏使灾害伴随城市的成长而增加;城市化加快,但城市规划及合理的安全布局未跟上,从而增加了城市对灾害的敏感性,城市防御气象灾害能力下降。同时,也要警惕不少灾害事故因气象灾害的发生而加剧或扩大化,要处理好我们迄今难以摆脱的气象与水利、气象与环境公害、气象与火灾、气象与公共卫生安全等的关系。

城市火灾与爆炸 近10年来,城市火灾的规律是:经济发达城市的火灾相当严重,重特大火灾发生频率高,群死群伤主要发生在公众聚集场所,大空间建筑恶性火灾增多,电气及用火不慎是引发火灾的元凶,火灾发生的时间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大量分析表明:(1)对于城市规划设计与管理者来说,缺乏安全减灾设计与设施是酿成火灾的“定时炸弹”; (2)对于建筑的使用者及公众说来,缺乏必要的防灾避险知识意味着灾难来临时逃生机会的丧失。

城市交通灾害 道路交通灾难被称作“文明世界的第一大公害”。美国著名学者乔治·威伦通过《交通法院》一书告诫世人:“人们应承认,交通事故比消防更加严重,因为每年交通死亡的人数在增加;它比犯罪严重,这是因为交通事故跟整个人类有关,不论是谁,只要

在街道及公路上，每一分钟都有遭交通事故的可能。”我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 2005 年略有下降，但已经连续 4 年徘徊在 10 万人左右，而 10 万人的死亡率是发达国家的 15~20 倍。纵观我国城市交通灾害，不仅表现在人员的高伤亡率，还表现在城市交通网络的欠安全以及由此导致的灾情扩大化、灾情连锁性及可诱发性。

城市生命线系统事故 城市生命线系统泛指城市供电、供气、供水及其通讯系统，广义地讲也包括城市紧急救援系统。它们构成城市的关键系统及网络，其质量与可靠性要在城市一般系统之上。城市面对突发事件，在所有系统中尤其要求生命线系统的高可靠度，但应承认：中国大城市供电水平偏低，供电能力不强；不少城市在冬季或其它用气高峰时运力不足；城市救援，尤其是灾害综合救援及备灾能力缺少科学规划，生命线系统应急管理水平低。

城市工业化灾害 悬在城市上空的“达摩克利斯剑”已上演了无数次悲剧。20 年前发生的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为人类利用核能、为城市安全投下沉重的阴影。它给今日城市事故与灾害风险研究的启示在于：要加强安全保障系统的高风险科学研究，同时也要关注一般风险技术，诸如城市工业化设施（化工厂、危险品等）的安全建设。面对大城市危险工业品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及使用的事实，在强化现场急救与紧急疏散机制建设的同时，要搞好泄漏物的处置、爆炸品泄漏物的处置、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泄漏物的处置、易燃液体泄漏物的处置、有毒品泄漏的处置及放射物品泄漏物的处置，增加对其规律的认识。

城市恐怖与安全 城市安全的另一个敌人是恐怖主义。2001 年“9.11”恐怖袭击和不断的炸弹事件使世人紧绷住神经。恐怖分子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无所不用其极。无论是东京奥姆真理教的沙林地铁毒气事件，还是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的人体炸弹，均使城市几乎成为无法摆脱的传染源。现代城市不得不无奈地承认，城市危机随时都可能生发。所以应从城市大安全观出发，使城市同时具备防恐怖袭击、防化学武器、防高新技术战争的综合反恐能力。

二、社会调查：北京城市居民危机意识的现状及问题

（一）北京城市居民危机意识现状

1. 从城八区的 2 300 份调查问卷中发现：就目前我国各种突发性重大灾害与灾难爆发的整体趋势问题，41%的公众认为是趋于好转，但也有近 1/4 的公众认为更为恶化；约 1/4 的北京公众认为没有明显变化（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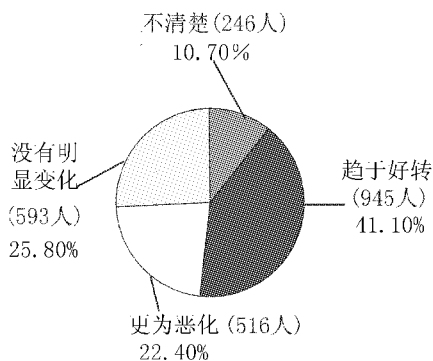


图 1 投票情况图

2. 在调查统计中发现，居民在重大危机避险能力方面仍有较大欠缺，特别是：

（1）有 75%的人不知道住所附近有无指定的避难场所；

（2）有 71%的人不知道工作、学习的地方附近有无指定的避难场所；

（3）有 52%的居民没想过如果发生危机事件应该如何避难。

3. 在危机发生时，占 5 成以上的居民希望快速通过电视、报纸、手机、互联网等主流媒体知道危机的发生发展情况以及防范手段。

4. 当突发危机事件发生时，人们最想带出的物品顺序为现金、存折、信用卡、证件、水和食品、手机。这个调查与国际上的结果略有差别：在国外，居民首选的物品是水和食品。

5. 遇到危机事件时，公众求助的情况如表 1 所示：在自然灾害危机发生时，公众主要采取的是自救；而在事故灾难发生时主要是拨打公共报警服务电话 110、119、120、122 等，这说明公共报警服务电话已经成为各种危机来袭时公众最主要的求助手段。

表 1 遇到危机事件时公众优先求助的对象

	台风	地震	火灾	室内有毒气体泄露	突发疾病	意外伤害	重大交通事故
自救	1 063	1 189	274	607	101	139	82
向家人求救	102	92	38	82	128	108	51
向朋友求救	29	28	36	27	38	55	31
向邻居求救	65	77	85	101	69	36	9
向单位求救	28	25	9	31	9	13	10
向街道办事处求救	116	104	37	53	26	30	26
拨打 119	166	160	1 614	492	93	52	162
拨打 110	297	222	109	418	162	771	846
拨打 120	114	107	47	455	1 473	917	754
拨打 122							110
拨打 999							1

此外，在购买保险方面，有 60%的居民为自己或家人购买了保险，这也体现了北京人已经把保险作为防范风险的一个重要手段。

（二）存在的问题

对北京城市居民危机意识的社会调查报告表明，近一半的居民，包括部分公务员，缺乏危机意识和相应的应对危机的知识。北京市民的危机意识虽然有所增强，但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2/3 的公众认为北京市民应对灾害的应对能力不强，很难适应“平安北京，安全奥运”的要求。

1. 对市政府危机管理现状不是很了解

70%的公众对北京市突发公共事件的基本情况不知道或不太清楚，80%的公众不清楚预警信号的含义，过半居民只知道消防、卫生急救等单一灾种管理部门。

2. 缺乏正确应对突发事件的知识与技能

有 75%的人不知道住所附近、71%的人不知道工作或学习场所附近有无指定避难场所，也不知道或没准备呼救应急电话；近 52%的人没有想过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应如何避难与应对；近 70%的公众没有接受过危机应对和生存急救的培训和演练；85%的公众没有参加过现场抢救。

3. 不同职业人群的应对意识与能力有较大差别，弱势群体为最低

以农贸市场工作人员为例：1/3 的人不知道

北京市编制的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全市平均 18%）；无一人知道住所与工作、学习场所附近有无避难场所（全市平均 1/4，社区居民为 3/4）；仅 10%的人知道求助电话（全市为 30%）；6 成人不知道有毒气体泄漏应采取何措施（全市为 3 成）；半数以上人不会使用灭火器（比全市高 12%）；自己和家庭购买保险的只占 10%（全市平均 60%）。此外，教师和社区居民也有半数以上不会使用灭火器，社区居民和自由职业者只有 20%知道求助电话（全市为 30%）。

4. 部分公务人员的危机意识不强，还有将近一半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分类、定义、预警信号及含义不甚清楚。

调查活动中，公众也反映出愿意配合的一面，他们对于问卷调查反应积极，表现出积极参与的意识和主动接受培训演练的愿望。92%的人认为制定经济发展规划应考虑灾难风险，81.5%的人愿意接收培训和演练，93.6%的人认为有必要在学校开设相应课程，78.0%的人认为培训应从小学阶段开始。

三、城市安全文化建构的基本问题

中国安全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为了生存、繁衍和发展，人类祖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对

付灾害与猛兽的经验,找到了维持人类生存的方式,这就是人类不断地解决物质需要和保障其活动的安全需求。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历程,实际上是人类文化繁荣的过程。企业安全文化及其与科技、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对推动中国的安全文化建设是十分重要的。人类对安全及灾害的认识不断深化,经历了无知、盲目、被动的阶段,才发展到局部有知、有意识的、系统的阶段。从中国传统救灾思想认识入手可归纳出对当今有借鉴意义的文化建设思路:(1)追求天人合一、物我合一,这是传统救灾思想的重要出发点,而“推天道以明人事”则是其重要的思维方式;(2)注重在节俭、积蓄、赈济基础上的开发性救灾,这是传统防灾思想的重要视角;(3)重视农学、气象学、建筑学、工具学等方面的防灾科目建设;(4)救灾管理思想在中国传统防灾活动中十分明显,虽有不少消极因素,但也有研究救灾效率及高效运作的管理机制的内容。

需要指出,安全文化绝不单单是有人讲的“文化安全”,而是一种随社会发展而出现的安全信息化、安全产业化、安全科教化的现代化文化形态,它毕竟不是过去的安全管理的简单“翻板”。这绝不是故意要将安全文化这一实践性专题搞得神秘化,也非“另起炉灶”,而是控制事故的新探索,是实践的新需求。安全文化建设的案例研究就是对一个文化过程的刻画和描述,有它自身的规范和方法,但案例研究重点要突出对企业、对社会、对公众有指导意义且源于实践的规律性的内容。安全防灾文化素质教育是一项有难度的特殊的科技与科普内容,因为它所涉及的范围不是常规科学技术,而是专门关注人们生存空间、生产与生活中的人为或自然的危险及危害的科学技术。不可否认,当代灾难来自于现代生活中高层人造空间和机、电、化学、毒气等物品的危险,来自于风暴、水灾、地震、地陷、泥石流等自然巨灾;对此,人类的基本法宝只有依靠当代科学技术。安全防灾自护文化素质教育的核心是教授人们多一份警觉,懂得一些安全自护平安的知识及规律,掌握必要的避难和应急的方法,从而在突发事件到来时临危应

变,争取最大的生存机会,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及损失。可以看出,这是与常态教育不同的特殊内容,而迄今我国尚缺少必要的教材及教师,最关键的是作为各级管理者对此尚未提高认识。作为各级管理者,必须认清灾害的巨大社会效应问题;要有特殊的责任感,要善于有效组织、平息谣言;要利用必要行政手段支持在大众媒体上开辟无偿公益性安全讲座栏目。

从理论上讲,社会公众的安全基础教育包括社会公众的安全意识教育、不同层次(如中小学生、大学生、老人等)的安全知识初步教育。安全是与人人相关的普遍问题,每个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安全要求,不仅与行为人的生命安全与健康密切相关,而且与周围相关的人员紧密牵连。所以,要开展社会大众的安全教育,要让每一个社会公民认识到“安全问题人人有责,酿成灾祸害人害己”,这对于防范社会公共事故有重要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对于培养人的安全素质及行为文明有深远的意义。因此,确立国民安全文化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相一致是追求安全少灾目标的关键。

近年来,井喷、火灾及爆炸、踩踏、游船翻沉、文物烧毁、全国城市暴雨致灾等安全问题被媒体通天热炒,这已是一种防灾预警的觉醒,但还必须对比中外公众在安全文化上的差距。

其一,中外公众的不同生命价值观。西方人——“惜命如金”、“珍视健康”;中国人——推崇“不怕苦,不怕死”,人的安康往往置于“事业”之后,从而导致了生命的“无视”与“践踏”,不少事故源于“要钱不要命”。

其二,中外公众的不同行为文化自律性。西方人——遵守安全规章制度,表现出自觉性及自律性,强调保障安全是人的权力;中国人——从古人至今,更多地强调用典范的影响力来影响行为,此种方式极不适宜现代城市化的生活方式,是频发“三违”现象的文化基础。

其三,中外公众的不同的“生命文化”原则。西方人——“生命第一”的文化原则是神圣

不可侵犯的；中国人——过多地宣传了“国家财产第一原则”，所以与“应急避险权”所主张的“生命高于一切”的安全原则格格不入。

其四，中外公众的不同安全技能观。西方人——美国早在1985年就组建了社区救灾反应队，美国国家防火协会经常组织北美统一的火灾“大逃亡”训练活动；中国人——现在还停留在对安全警钟的认知上：2003年非典至今，全国共举办过近50万人参加的近800次各类防灾演习，但每次事故惨剧暴露出的问题还都是安全知识、安全技能、安全产品上的问题，它告诫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系统地开展公众安全文化教育。

具体地讲，要提高城市的公共安全防灾文化意识，还应关注两点。其一，政府对公共安全职能的定位。无论是“新北京、新奥运”，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公共安全问题都已成为人们的公共需求。按照美国学者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们在温饱及生理需求满足后，安全生存已成为首要目标。公共安全对于一个城市而言，不仅是一种需求，更成为一种文明标志，因此应成为考查政府绩效的关键指标。其二，公众的安全是人们做事的前提。安全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研读并实践它正是当今遏制公共事故危机的良方，其关键点在于不要就“事故论事故”，而是从更高的文化层面去剖析事故灾祸的发生背景中人为致因的种种要素。(1) 城市灾难“馈赠”给人类的难题，要求人类去正确解读。面对突发事件，很多人的心理可能出现过度的焦虑、无助、沮丧与恐慌，但逆境催人成熟，从安全文化层面上讲，灾害有理由且事实上使人类演习了应对灾难。不能不承认，由于我们平时太缺少准备而经历了茫然、无措、正视、反思，逐步地调整到镇定，不能说不是一个痛苦的安全文化建构过程。(2) 城市灾难更呼唤行政与制度的安全文化重铸。文化的重铸在危机开始时并未凸显，它是长期以来社会上一些思维惯性与惰性的反映，事实上也是对我们向来以乐观主义为主流的文化习性的写照，这分明是一种危害极大的文化习性。(3) 城市灾难如2003“抗非”中体现出公众的责任及关怀，更体现着一种

可贵的安全文化的人性化。应该说，由于全社会安全文化教育不够普及，公众中发生一定程度的恐慌是灾难事件中正常的初步反应，但由于灾难本身及公众复苏希望，人们及社会的“人情味”开始变得浓郁，增加了一种对生命价值更深刻的理解，这是安全文化的警策性作用。

四、思考与建议

上述分析表明，如何构建城市安全减灾的意识及文化教育框架是目前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其意义在于安全文化及素质能力教育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要条件，安全文化尤其是自护能力是国民素质的重要反映，提高全民族安全文化是自觉遏制事故灾害高发的根本性有效途径。为此，必须从安全文化的政府形态的代表者公务员、学术形态的代表者知识分子、大众形态的代表者城市居民、未来形态的代表者学生等层面进行安全文化教育的整体规划及可行的教育方式设计。

1. 要制定《全民安全文化及危机应对意识教育的国家规划》(2007-2010)。结合2007年即将出台的《国家突发事件应对法》、《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及科学普及相关法律条例，从提高全民族科学素质入手强化国民安全文化教育。尤其要从综合减灾及国民忧患意识等“大安全观”的高度出发，抓住每年的“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国际气象日”、“国际地球日”、“国际环境日”、“7.28唐山大地震日”、“安全生产日”、“国际减灾日”、“11.9消防日”等，统一做好系统化的防灾减灾教育，使教育日有充分实效且互为补充，体现出城市防灾减灾教育的特点。建议由中国科协牵头，要求各省市科协组织本省(市)安全文化教育规划的编制，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全国特点的安全文化教育纲要。在此方面北京市科协应起到带头作用。

2. 当前尤应结合2008年奥运会、2009年共和国成立60周年、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实际需求及特点，研究不同人群的安全文化自护教育模式，如必须研究疏散中不同人的心理行为

特征,针对大型群体社会活动发生事故的特点落实预防的对策。这里涉及大型社会活动的风险分析、大型社会活动人员流动状况控制、大型活动安全责任管理等问题。重点是要先期启动以“安全奥运”演练为中心的安全文化自护演练,在奥运场馆及周围的社区、学校、企事业单位和公共场所模拟火灾、地震、公共场所骚乱、生命线工程重大事故等重大灾害的现场抢险、救护、疏散及秩序控制管理;要在提倡“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绿色奥运”的同时,大力提倡“安全奥运”的理念,以确保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顺利举办。

3. 要有重点按层次地开展安全文化教育试点工作。就城市防灾减灾建设而言,社区、校园是两大方面。之所以要推进安全文化教育,是为了避免单纯抓“应急避险”的不足。要按照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结合中国实际开展城市安全社区的创建,其核心是将社区常态安全建设、志愿者队伍建设与应对避险、应急预案相结合,自下而上地完善家庭防灾计划,组织好社区的安全应急演练;在大中小学要倡导安全校园及学生的安全文化教育,尤其要改

变大学生对灾害基础知识认知不足的现状,要通过教育部及各级科协组织的不懈努力使他们的减灾态度积极起来,减灾行为能力得到根本提高;对于中小學生,尤其要开展有特色的课内外相结合的安全文化教育活动,充分利用现实中经常发生的灾害事件教育中小學生。总之,要利用联合国减灾战略的观点强化灾害文化教育,使“教育是减轻灾害计划的中心,知识是减轻灾害成败的关键”的命题真正深入到我国的科普和教育之中。

参考文献

- [1] 北京减灾协会. 2006年“北京城市居民危机意识社会调查”分析报告[R]. 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 2006
- [2] 金磊. 城市灾害学原理[M]. 北京: 气象出版社, 1997
- [3] 金磊. 安全奥运论[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作者简介

韩淑云, 北京减灾协会高级工程师; Email: bjjzxh@vip.sina.com

金磊, 北京减灾协会常务副秘书长,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副秘书长, 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团专家。

(上接第51页)

- [11] 简讯. 蒙牛“特仑苏”摘取世界乳业最高奖[J]. 中国乳业, 2006(10): 39
- [12] 王大庆. OMP增强骨密度项目通过专家评审[N]. 光明日报, 2006-04-06(008)
- [13] 赵英淑. 以科技创新实现产业突围[J]. 科技日报, 2006-04-04(005)
- [14] 刘艳芳, 唐卫. 以OMP开发营养健康食品有了科学依据[N]. 中国食品报, 2006-04-07(005)
- [15] Hamlett, Patrick. Technology theory a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J].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2003, 28(1): 112-140
- [16] 克里斯托弗·托默. 科学幻象——生活中的科学符号与文化意义[M]. 王鸣阳, 译.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9
- [17] 赵万里. 科学技术与社会风险[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1998, 15(3): 50-55
- [18] 斯蒂芬·夏平. 真理的社会史——17世纪英国的文明与科学[M]. 赵万里, 译.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2
- [19] Wynne, Brian. May the sheep safely graze? A reflexive

- view of the expert-lay knowledge divide [A]. In Lash, S., Szerszynski, B and Wynne, B (eds.), Risk, Environment and Modernity, SAGE publication, 1996: 44-83
- [20] 尼格尔·多德. 社会理论与现代性[M]. 陶传进,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 [21] Locke, Simon. Sociology and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from rationalization to rhetoric [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1, 52(1): 1-18
- [22] 保罗·K·法伊尔阿本德. 自由社会中的科学[M]. 兰征,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0
- [23] 罗伯特·K·默顿. 科学社会学散忆[M]. 鲁旭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作者简介

徐凌, 北京大学哲学系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科技政策; Email: xuling@pku.edu.cn

马乐, 昆明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硕士, 研究方向为科学社会学; Email: digicommale@163.com